

# “中国之声”的形塑： 人民广播对外广播 80 年回望

高贵武 乔秀宏

[提要]2021 年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诞生 80 周年。80 年来,对外广播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革命之声”“国家之声”“改革之声”和“融合之声”阶段性地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声音中的政治意涵亦清扫了战时舆论障碍,巩固了新生政权,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增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量。本文沿着声音与政治“互构”的视角系统梳理了人民广播对外广播的发展历史后提出,以“柔性”方式坚守国家站位、引领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和依靠各级各类对外广播的合力,将赋予对外广播更多的发展可能。

[关键词]对外广播;声音政治;听觉文化;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9—0134—07

作者简介: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视听传播;乔秀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北京 100872

作为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广播天然的空间偏向使得“世界不远,就在耳边”成为现实。由于无线电波传输带来了“地域的消失”,“主要以国外听众为传播对象”<sup>[1](P.33)</sup>的对外广播亦成为可能。自 1927 年 10 月 14 日荷兰创办面向远东的对外广播起,国家和地区间的对外广播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1 年 12 月 3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建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日语广播,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正式发端。

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体现了声音维护意识形态及生产运作政治话语的作用<sup>[2]</sup>,也为声音栖居的媒介空间提供了一种文化政治研究视角。通过声音可以听到社会历史变迁的状况,感知社会内部各个方向力量的运转变化,对外广播自始至终与政治共生,既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时期宣传政治、争取外部舆论支持,又依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一支后起却不可忽视的力量。基于此,本文遵循作为社会支配体系的声音政治的研究范式,考察人民广播对外广播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探寻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对外广播连续、深层发展的逻辑驱动力。

一、诞生于烽火、服务于战争的“革命之声”  
(1941—1949)

20 世纪 30 年代末,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已有的自办报刊宣传难以冲破日本侵略者的新闻封锁,为使大后方的武装组织与沦陷区的群众及时知晓党的方针政策和事件真相,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延安台)于 194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中共中央采纳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建议于 1941 年 12 月 3 日正式开办日语广播的硬件基础。尽管起步晚、设备简陋的人民广播为早期的对外广播埋下了时断时续的隐患,但战争中诞生的基因则使其一出生就承担着鲜明的服务于战争的政治宣传功能,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作专门指示称为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在国内战争形势发展下,中共中央向北京(北平)转移,延安台也在 1946 年 3 月至 1949 年 3 月间经历了瓦窑堡(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涉县、平山县、北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四次转移,并最终使得“以延安台为中心的人民广播初具规模”<sup>[3]</sup>。与此同时,对外广播也经历了从仅依靠延安台到同时依托由华北、东北地区一小部分日伪广播电台改建的新的人民广播电台;从“XNCR”单个呼号到多个呼号并存;从“每周三半个小时”<sup>①</sup>播音的日语广播到 1945 年 10 月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新闻节目,再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sup>②</sup>转播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接力播送英语广播的过程。尽管对外广播的宣传

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彼时的对外广播严格意义上讲还仅是一种外语广播。

因战争与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对外广播的定位是“瓦解日本军队,涣散日本军心”<sup>[4]</sup>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介绍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军民关系、民主生活”<sup>[5] (P.124)</sup>,让广大侵华日军和其他境内外的外国听众通过对外广播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与中国内战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一时期对外广播的内容也常常随着战斗宣传的需要不断调整。抗日战争时期日语广播稿件大致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在华反战同盟编写的有关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二是中国抗战新闻和来源于新华社电讯、《参考消息》等方面的国际新闻。<sup>[6] (P.3)</sup>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英语广播和日语广播分别成为华北、东北两地最主要的对外广播类型,前者“向讲英语的世界各地听众播送有关中国时事的简明、真实的报道”<sup>[7] (P.268)</sup>,后者则借助中央和区域性媒体的新闻、评论,加强对抗战胜利后滞留东北、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的宣传管理。如大连广播电台1946年开辟专门的日语时间,至1948年日侨量少时停办;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同年7月开始广播《日语新闻》,至1949年6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复播时停办。<sup>[8] (P.62)</sup>在人力、物力、财力匮乏的条件下,精心、紧凑的政治军事内容与交错、连续的编排时间,凸显的是党中央集中一切力量开展对外广播和思想宣传的决心。

由于内容以新闻为主,这一时期对外广播的形式整体也呈现出鲜明的战斗姿态。在稿件内容上,按照野坂参三在延安台建台初期的建议,新闻简明扼要、只摆事实、不加意见,与评论、述评、综述进行充分区分,避免在不知敌情动态、不懂日军心理的情境下一成不变地使用对内广播的稿件。如1948年新华社社即以规章制度的方式要求口播稿件“力求写得口语化,意思简明,头绪清楚,一听就懂,并且生动而富有说服或鼓动的力量”<sup>[6] (P.15)</sup>,进一步规定了对外广播稿件的标准和规范。在播音形式上,尽管人才短缺使对外广播仍面临着单纯语言层面的挑战,甚至要中共领导人来动员外籍人士参与信息传递最终环节的播音工作,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第一人原清志(日籍)却凭借语气笃定、音质好听、吐字清晰、外语发音规范而成为对外广播初期播音员的典范。“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憎爱分明、坚定豪迈的情感,沉着从容、真

理在握、稳健大度、朴素平易的气派”<sup>[9] (P.197)</sup>成了这一时期所推崇的播音风格。

特定的历史语境促进了人民广播对外广播事业的起步,对外广播作为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新型现代化工具亦对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出现了一些日本士兵在收听了延安台的日语广播后向八路军投降,甚至是集体投降的情形,对日广播频率附近突增干扰更是从侧面证明了对外广播取得的成效。<sup>[5] (P.8)</sup>而在气象条件好的情况下,南亚、东南亚、北美西部、东欧等多个地区的国家都能收听到中国的英语广播,这为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清扫了国际舆论障碍。正是利用对外广播发出的这些“革命之声”,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完成了凝聚战时共同体、在思想上瓦解敌军的阶段性任务,也使对外广播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不同于对内广播的特殊使命。

## 二、调整宣传方式、巩固新生政权的“国家之声”(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国有国营体制下的对外广播事业亟待改善技术落后、传播能力薄弱的境况。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依照轻重缓急理性制定了“先中央台、后地方台,先对国外广播、后对国内广播”的建设方针,在“一五计划”期间用于广播基建的1.32亿元专项资金中,中央台占比达75.76%<sup>[10]</sup>。1950年4月10日,英语、日语、朝鲜语(试播)、泰语、缅甸语、印尼语、越南语七种外语广播以“北京广播电台”呼号,针对东南亚华侨的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客家话四种方言广播仍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sup>③</sup>呼号。至此,对内、对外广播共用一个频率、呼号的时代结束。

为应对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包围威胁、经济上的封锁禁运、舆论上的反华渗透等动荡分化的国际形势,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中国分别奉行的是“一边倒”和“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受其影响,对外广播的舆论宣传除了正面宣传国内战争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增强、大规模建设的成就外,还增加了对亚洲各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和揭露反民主阵营的报道。此时的对外广播一方面报道国内和国际新闻时事,比如在各语言节目播出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讲话、英语广播协同朝鲜语广播报道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反侵略战争等;另一方面也为满足对象国听众的收听需求,设置了丰富多彩的

专题节目介绍中国的戏曲音乐、语言文学及自然风光。随着中国政府对外合作与交流逐步展开,1951年起中国陆续与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商定互换广播节目的录音,“寄送节目”成为中国对外广播的第二种方式,直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苏间原有的“寄送节目”才从互相删节走向彻底停止;1953年起中国又接连与匈牙利、印尼等国家签订广播合作协定;1954年起捷克、日本等国家也开始派遣广播工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显然,和平年代对外广播的目标已从“为战争服务”转变为“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新闻抑或教育娱乐皆是一种配合外交斗争、树立独立自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上的服务”<sup>[11]</sup>。

1964年4月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业务整改草案》指出,对外宣传的对象应以政治上的中间分子为主<sup>[12] (P.120)</sup>,为此中央广播事业局特意成立了听众服务组处理众多听众来信,听众范围的扩大与批判性的反馈意见令对外广播的表现形式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全部是呆板、生硬的灌输式宣传,其中政治与文艺合理配比的柔性手段赢得了听众喜爱。就播音形式而言,对外广播不仅继承了延安时期“憎爱分明”的播音风格,还随着节目内容及宣传手段的多样化趋向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sup>[9] (P.198)</sup>。正如一封关于越南语播音员曾虹的听众来信所述,“她清晰、坚强、有力的音调传播着中国共产党锐利和感染人心的论点,使人们着了迷,不愿离开收音机。”<sup>[6] (P.134)</sup>

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顺利、超额完成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诸种原因,对外广播也历经了新的挫折与考验。其一,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对外广播部门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温济泽、陈润康等一批冤假错案削弱了对外广播事业的人才队伍。其二,为配合政治宣传,国内广播制定了“多、快、好、省办节目、办事业,为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为保卫祖国、灭资兴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的“大跃进”方针,强调“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sup>[13]</sup>对外广播同样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建设日历》《不可抗拒的洪流》《在人民公社里》等节目片面、浮夸地追求政治宣传,形式上只讲数量、不求质量,轻视编播技巧。直到1961年八字方针实施,我国广播系统才确定了“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方针,通过一系列试听会、审

听会和听众意见调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推动对外广播走上正轨。

这一时期的对外广播事业建设可谓一波三折,一边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边反过来依靠社会既有的设备基础,其整体规模得到了快速恢复与空前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对外播音已有汉语普通话、四种方言和二十六种外语,三十一个语种能够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sup>[14] (P.251)</sup>;并在对外微波干线的助力下,陆续新添了十二种外语广播,即使这一增势未能全部转化为质量保障,但同样为中国跻身仅次于苏美的对外广播大国队列铺平了道路。而声音文本暗含的负责任、敢担当的政治形象和良性运转的国民经济状况,则反映出了日益提升的国家声誉和国家实力。

三、转变传播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改革之声”(1978-2000)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此时,负责对外广播工作的原中央台对外广播部已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国际台),成为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立的单独机构,节目则仍沿用“北京广播电台”<sup>④</sup>的呼号,“广播外宣基本等同于国际台广播”<sup>[15]</sup>的对外广播事业步入了黄金发展期的快车道。

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和不断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世界各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对外广播也开始打开了向所有外国人传播的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和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会议分别紧扣事业建设、宣传工作与改革发展三个核心议题。对外广播“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中心任务以及20世纪末要建成“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现代化宣传网”的奋斗目标得到明确<sup>[16]</sup>。先前优先发展国际台、单纯面向国外广播的对外广播已经无法满足对外宣传的系统性与强度要求,对内和对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开始调整和改善。在国内方面,国际台为照顾在华外国人的收听需求,先接连开办了英、法、日、德、西班牙语广播,后又启用两个频率分设播音时长十八个小时的英语广播及阿拉伯语、朝鲜语等九种语言的多语广播。在地方一级的对外广播方面,从受“四级办广播”方针指引,1984年广

西对外广播电台向越南试播自办节目拉开省级电台真正意义上对外广播的序幕,到1994年首届全国广播对外宣传协作会议提出“建立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龙头,以各省(区、市)台为依托的广播大外宣网络”<sup>[17]</sup>(P.168),对外广播开始出现省市级电台转播、地方与中央通力合作、自办模式并存的体系化局面,体系化的宣传思维也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这一期间,在“对内解除左的政治禁闭,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松绑”的背景之下,“声音政治不再僵硬,有了弹性”。<sup>[18]</sup>由于受到“珠江模式”的影响,对外广播的节目类型愈发细化,新闻、文艺、经济、体育、社教等各类节目层出不穷,有关中国经济建设内容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而此时的为经济建设服务大致等同于为政治服务,对外广播的“第一位功能仍然是引导舆论”<sup>[19]</sup>(P.393)。80年代我国推行的“无敌国外交”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自由的外部环境,利用这一时机,国际台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sup>[20]</sup>,不仅建设了评论队伍、外事采访队伍,还在东京、贝尔格莱德、巴黎等重要国家的首都和地区创建了驻外记者站,组建了驻外记者队伍。编采团队的壮大一改以往内容说理性弱、时效性差、取材狭窄、信源贫乏的弊病。对外广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紧跟时代潮流创新的政治自觉通过自力更生的内驱性逻辑更加彰显。

伴随着制度、体制改革,对外广播的形式亦出现了多元化探索。在结构设置上,“新闻、专稿、音乐”僵化的三块式模式<sup>[21]</sup>被打破。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方式上,实况广播、与电视台合作进行现场直播和通过越洋电话实现驻外记者的现场口头报道等新形式缩短了“新闻一听众”的心理距离及时间距离。在播音形式上,随着80年代融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特点于一体的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对外广播总体呈现出通过“降低”音量语调、“声断意连、声断情连”的停连和“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sup>[22]</sup>(P.121),营造出亲切诚恳、平易近人的播音风格。而在传输形式上,面对90年代对外广播发展面临的发射功率不足、收听效果欠佳的主要矛盾<sup>[23]</sup>,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规划纲要指出,“八五”期间要重点建设中国国际广播中心和对外发射台,促使卫星传输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取得不同程度的新进展。1997年国际台建成的十部短波发射机和四部中波发射机投入使用,全部节目被送上国际卫星后

可再借助互转、租机的形式播出<sup>[24]</sup>(P.236);国际台新大楼即中国国际广播中心工程也在同年正式启用,并通过计算机信息处理中心和播控中心实现了节目制作播出的自动化及数字化,<sup>[25]</sup>(P.217)通过“数字光缆、数字微波和数字卫星”接力完成了传输的数字化<sup>[26]</sup>(P.318);1998年国际台将汉语普通话、广州话、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五种语言的对外广播节目连接至国际互联网<sup>[27]</sup>,在线阅读文字稿件与在线收听直播、录播广播节目的新形态正式出现,技术由此上升为对外广播事业进步的核心动力之一。

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稳步提升的经济总量和大步向前的科学技术,为对外广播践行专业主义理念提供了更大的调整空间,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外广播的效果。这一时期,国外听众俱乐部、听众协会等听众组织快速增多,国外听众参与知识竞赛、主题征文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听众来信数量逐年攀升,国际台在各国举办的国际广播评比中多次斩获奖项。对外广播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并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可以信任的舆论力量,推进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发展,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如美国就有听众来信称“北京电台在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起到了一部分作用”<sup>[6]</sup>(P.248)。由于传播效果不断凸显,对外广播营造的和谐氛围为党和政府处理国际关系节省了精力,也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 四、适配全球化趋势、增强中国声量的“融合之声”(2000-2021)

初入21世纪,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全球化步伐,更使得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国内事件愈发受关注,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把自己的声音传向世界的同时更多关注国际事务。为破除“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不实论调,提高中国在解释全球和地区事务方面的话语权,扭转“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2004年中央领导视察国际台时提出“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的总目标,并提出要“一手抓好无线广播,一手抓好互联网的在线广播”<sup>[28]</sup>。2009年6月,中央下发“24号文”,明确指出要把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sup>[29]</sup>。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领之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国家外宣成了对外广播的新常态。

2014年,国际台已形成六十五种语言的对外

广播规模,最大限度突破了语言导致的界限和区隔。这一时期对外广播的内容也开始迈入“全球内容、中国价值”<sup>[30]</sup>的新境界,各类型节目皆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价值能被世界各国理解和接纳为诉求。《新闻与报道》《圆桌议事》等新闻节目坚持国家立场,《民乐逍遥游》《摩天轮》等文艺节目孕育审美价值,《孔子学堂》《轻阅读》等社教节目展示中国文化,《听众信箱》《健康中国》等服务类节目关心受众需求。部分节目甚至通过与国外电台协作确定选题、联合实地采访来消除共享文化、政治背景的“自己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壁垒。除了中国问题,对外宣传报道的议题还涉及印巴局势、国际扶贫大会、朝鲜半岛问题等国际事务。“讲好中国故事”也不仅仅是讲事实,更是以战略思维和宏观视野在讲述中国的动态发展以及与整个世界的关联。<sup>[31]</sup>如国际台面向西非豪萨语地区开设的《有你就有家》节目,就借由国际消除妇女暴力日、巴基斯坦维权少女玛拉拉·尤沙夫赛、SOS 儿童村组织等带有国际化视野的选题,将平等、和平、友善、和谐等中国价值寓于事件来龙去脉的客观报道之中。

与此同时,对外广播争夺海外舆论阵地的形式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表现。宣传模式上不再像之前那样“太白、太直、太露、太生硬”,而是开始透过文化生活和社会问题以小见大地讲政治,<sup>[32] (P. 315)</sup>运用城市风情、民俗文化、历史故事等元素多角度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加强我国话语实践的“自塑”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播音当中聊天式的语态、明快流畅的节奏、严谨即兴的逻辑与自然亲切的风格便巧妙地把政治目的藏于声音之后,灵活智慧的话语策略则深入目标受众的内心。而在落地方式上,早期的境外代理、租机发射等手段虽具有扩大覆盖面积、稳定传输信号、照顾收听习惯的作用,却未能真正实现节目的体系化编排和本土化互动,中国开始借鉴西方国家境外落地的经验,大力推广“整频落地”。其中,自行建台、外宣与外援合二为一的经援建台、代理建台等境外建台新模式,以及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对华媒体管制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境外租台、购买电台等新举措应运而生,对外广播由此进一步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

这一时期互联网技术的改进给对外广播形式带来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传统广播与互联网结合包含广播网络化和网络广播两个由浅入深的阶

段,如果说 20 世纪末广播网络化颠覆了广播长期以来单一的传播渠道和线性的收听方式,进入 21 世纪后的网络广播则打破固化的传受关系,充分发挥了声音可植入性强、伴随性强的优长。国际台网站“国际在线”推出的“多语种播客业务”和“手机广播电视业务”,便让受众成了用户甚至是生产消费者,满足了广播用户个性消费和移动场景的新需求。对外广播整合多方面资源,统筹协调国内外重要传播力量,形成了“集图、文、音、视、网页等于一体的多媒体信息流”<sup>[33]</sup>,并随着“广播媒介形态从有形到无形,应用领域从有边界到无边界”<sup>[34]</sup>的路径向融合化发展迈进。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制,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sup>[35]</sup>“头部”媒体的融合与国务院直属、归中宣部领导的管理体制重申了“国家队”概念,顺应了对外广播提升外宣声音强度和业务承载能力的诉求。这一时期的传播内容,如融媒体产品《春风习习》,便以声音、图文(动图、照片、手绘、漫画)、短视频、微直播等融合形式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念,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推送后获得了大量海外用户的积极评价。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传统广播、网络广播、融合广播一起构成了对外广播的基础形态,其内嵌的政治目的渗透于经济开放、文化交融、社会进步等方方面面,进一步促进了“硬”宣传与“软”传播紧密交织的新型对外广播局面。如今,国际台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覆盖,境内外多语种新媒体账号粉丝数量的增长及 China 系列多语种移动客户端下载量的攀升,从不同侧面表明,作为国际传播重要组成部分并朝着音频化发展的对外广播的规模及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国距离国际舞台上引领者的角色更近了一步。

## 五、结语

回望历史,人民广播对外广播 80 年的发展既是中国广播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一段见证中国变迁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声音政治史。一方面,政治的建构性力量推动对外广播从无到有、时间从短到长、语种类型从少到多、形式从僵硬到灵活、内容从单一到丰富、人才队伍从弱到强、辐射范围从小到大;另一方面,对外广播里的声音政治不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凝聚

人心 在国弱民穷的时候巩固新政权 而且在现代化建设的关头稳步推进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放大中国声音、提升国家国际地位。从人民广播对外广播 80 年的发展历程来看 声音与政治的“互构”既是政治动力下对外广播应对环境、技术变化以迈向大众化、专业化的过程 也是对外广播通过传递多元声音、塑造国家和执政党形象来影响政治系统的过程 更是我国对外广播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亦对未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政治挂帅始终是对外广播的第一要义 但对外广播同样需要淡化政治宣传色彩。中国抑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开办对外广播的根本目的均是为了反映本国的立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以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方式来增强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这使对外广播不仅不可能回避政治 而是要始终坚守国家站位 根据外交政策需要和对对象国文化的理解来采取受众喜闻乐见的信息接收形式 提前做好国际视野的战略布局及政治性内容的柔性处理。近些年 处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中的国际台虽然愈发注重培养亲切柔和的媒体形象 在对外广播的内容和形式上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但仍未能充分发掘“民间舆论场”的潜力 本质上仍属官方声音的一枝独秀。2019 年 5 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的刘欣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商业频道的翠西·里根以个人身份就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展开的“约辩” 被媒体观察人士称“可能起到了报纸 1000 个版面、广播电视 1000 小时播放时长”的特殊效果<sup>[36]</sup>。这一国际传播范畴内的非官方对话展现了意见领袖向目标群体传播观点的成效 更增添了不同的、民间的声音深入探讨某一国际议题的可能性 为对外广播冲破意识形态宣传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当然 由于兼具外语表达能力、海外国民认知度和国际事务分析研判能力的人少之又少 对外广播系统培植涉外的意见领袖、打造“民间舆论场”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尚须统筹规划。

第二 国际传播技术范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 包括对外广播在内的中国国际传播仍须加快技术创新与应用步伐。过去 强势政治引领了世界近一百年间传播技术范式的数次变革 当下 改变各国对外广播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互联网技术成了国际传播竞争格局的重构性力量 各国都在积极依托该技术增加本国在世界上的声音 以求

反哺政治。中国的“三网融合”“智慧广电”“5G 传输”等战略目标陆续迭代升级 恰如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做出的指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sup>[37]</sup>。中国的对外广播与其他媒体一样目前仍处于媒体融合的初级阶段 其融合发展除了要主动拥抱新技术外 还要坚持传统对外广播节目的制作特色 保证其不被新技术束缚和湮没 凸显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地位。媒体融合要由简单的资源层、平台层向复杂、一体化的工作流程层和涉及机构调整、岗位优化的架构层转变。<sup>[38]</sup>因此 中国的对外广播需要抓住互联网技术变革的跃升契机 加强境内外媒体机构的联动 提高媒体资源的利用效率 满足国际受众的分众化需求。

第三 建构全面生动的国家形象 不仅需要国家级媒体的引领和实践 更需要各类、各级对外广播的通力合作和优势互补。人民广播的对外广播事业是在政局变化的强烈召唤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前近四十年的时间里 由于国力孱弱 对外广播优先发展国家台实属不得已。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中国综合国力逐渐提升 地方台甚至个人自媒体的对外广播建设不仅成为可能 更是对外传播的有益补充。为了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 更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急需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声音。未来 对外广播需要兼顾中央和地方乃至个人自媒体的发展 利用好各地的语言、地缘、人脉、文化优势 丰富区域性的媒体外交活动 深化中央地方通力合作的模式 补充中央媒体的对外广播内容。目前 个别地方台的对外广播与成功的自媒体个案已经做出了良好示范 例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创办的面向东盟国家广播的“北部湾之声” 开创了中央媒体和省级媒体合办对外广播的新模式 对外宣传“走进去”效果非常明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用喀尔喀蒙古语向蒙古国播出的“草原之声” 则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总体格局 提高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以自媒体形式出现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之上的李子柒更是以其“个人”之力在西方民众心中建构起了对中国的“向往”。一言以蔽之 无论是地方台还是个体化新媒体 对外广播在通过细节展现国家形象、加强外宣的针对性方面仍

有较大的潜力可以释放,如何有序地推动其差异化发展以增强对外广播的整体合力,同样值得进一步思考。

#### 注释:

①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的播出频率有日播、周三播、周五播三种版本,但《日语广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 红色电波如春雷令敌人胆战心惊》一文中,原清志谈到每周一次骑马去播音,《日语广播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国际广播展示出辉煌的前景》一文中,肖岩将周五播音纠正为周三,参见:黄达强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8-21页。

②1946年10月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转移至河北省阜平县后改名为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原是为作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后备电台创建的。参见: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0页;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③1949年9月和12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先后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见: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④1993年1月1日,国际台的呼号由“北京广播电台”变更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参见:夏吉宣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

#### 参考文献:

- [1]赵玉明,王顺福主编.广播电视词典[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
- [2]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J].中国图书评论,2012(12).
- [3]哈艳秋.彩练当空舞 电波传九州——纪念人民广播60周年[J].现代传播,2000(6).
- [4]原清志.帮中国人打日本鬼子是最正确的选择[EB/OL].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gb/42071/2015/08/18/5311s5070493\_1.htm,2015-08-18.
- [5]黄达强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6]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7]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8]彭芳群.政治传播视角下的解放区广播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 [9]姚喜双.中国播音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 [10]陈超英.广电部历次五年计划广播电视资金投入情况的分析[J].广播电视信息,1996(3).
- [11]庞亮.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毛泽东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简论[J].现代传播,2003(6).
- [12]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 [13]梅益.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J].新闻战线,1958(5).
- [14]许海.从“探索调整”到“改革创新”——新中国广播60年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A]//新闻学论集(第23辑)[C].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9.

- [15]肖红旗.国际台广播外宣协作的发展特点和趋势[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6).
- [16]葛娴.以宣传为中心改革广播电视——记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J].新闻战线,1983(5).
- [17]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
- [18]张涛甫.当下中国的声音政治[J].学术界,2018(3).
- [19]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 [20]覃榕,覃信刚.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与主要特征[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10).
- [21]胡耀亭.改革开放与对外广播[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6).
- [22]喻梅.新中国播音创作简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 [23]学惠.中国国际广播学会举办“90年代我国对外广播发展战略”研讨会[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0(1).
- [24]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研究室编.对外宣传工作论文集[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
- [25]丛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26]哈艳秋主编.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
- [27]李广才.对外广播50年[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9).
- [28]访王庚年台长 谈拓展中外媒体交流的新渠道[EB/OL].中国记协网,http://www.xinhuanet.com/zgjc/2007-08/08/content\_6494903.htm,2007-08-08.
- [29]程曼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09—2017年)[J].新闻与写作,2007(8).
- [30]王庚年.中国国际传播的三重境界[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11).
- [31]Peilei Ye, Luis Albornoz. Chinese Media “Going Out” in Spanish Speak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CGTN - Español [J].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Vol. 13, No. 1, 2018.
- [32]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03.
- [33]王冬梅.发挥国际广播优势 实施大奥运外宣战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6).
- [34]董云.以声为媒:广播30年媒介形态衍变[J].中国广播,2016(12).
- [35]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21/c\_1122570517\_3.htm,2018-03-21.
- [36]周振华.浅谈民间对话在对外传播中的运用——以中美主播“约辩”中美经贸摩擦为例[J].对外传播,2019(8).
- [37]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2019-01-25.
- [38]范建平.国际在线:从网络化走向融合发展[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9).

收稿日期 2021-02-28 责任编辑 刘立策 王启涛